



留学生 与中外文化交流

主编 安宇 周棉



南京大学出版社

留学生 与中外文化碰撞

◎ 张国平 编著



张国平著



留学生 与中外文化交流

主编 安宇 周棉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安宇, 周棉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2
ISBN 7-305-03584-X

I. 留... II. ①安... ②周... III. 留学生教育—作用—文化交流—中外关系—研究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1173号

书名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主编 安宇 周棉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址 www.njupress.com
电子函件 nupress_1@public1.pv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27千
版 次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定 价 18.50元
ISBN 7-305-03584-X/G · 512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留学生的角度,对鸦片战争以后到20世纪前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作了新的概括、总结和分析,认为在此过程中,留学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留学生和留学运动,从其源头来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其本质而论,又是向西方学习的形式;从文化交流的性质来看,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留学生应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桥梁和中介;从其结果上看,不仅形成了晚清民初世界文化史上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潮,更由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的大量引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型态和社会型态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变,从而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论,从宏观上分析、论述了中学西传的历史和西学东渐的起因、过程、性质、特点和意义;上编,重点论述了留学生在晚清和五四时期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下编,重点论述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严复、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人的贡献及个性特点。

目 录

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与影响..... (1)

上 编

第一章	留学生与晚清的西学东渐	(65)
第二章	留学生与五四运动(上)	(77)
第三章	留学生与五四运动(下)	(103)
第四章	留学生与逻辑学的东渐	(127)
第五章	留学生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140)
第六章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54)
第七章	留学生与西方美术在中国的引进	(179)
第八章	留学生与中西美学的融合与发展	(191)
第九章	留学生与中国的新史学	(218)
第十章	留学生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248)
第十一章	留学生与铁路在中国的修建	(279)

目 录

- 第十二章** 留学生与物理学在中国的历程..... (297)
第十三章 留美学生与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313)

下 编

- 第十四章** 严复与西学东渐..... (327)
第十五章 蔡元培与中外文化交流..... (340)
第十六章 鲁迅与中外文化交流..... (360)
第十七章 胡适与中外文化交流..... (378)
第十八章 林语堂与中外文化交流..... (398)
- 后 记**..... (425)

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 贡献与影响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文化得以发展和提高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由最初的混沌、野蛮、愚昧不断走向清朗、文明、科学的必由之路。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曾产生过多种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文化，如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等。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前，由于人类还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受到很大的阻碍。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关山迢递，路途遥远，千百年的文化交流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相对于 16 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来讲，其规模、速度都是比较狭小、低速的。16 世纪前后，人类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文化比较先进的印度、阿拉伯、中国等国家，或分裂，或闭关自守，发展缓慢，逐渐成为时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代的落伍者，而欧洲则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最先在意大利，接着在西欧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欧各国纷纷向外大规模地扩张，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欧各国在对非洲、美洲、亚洲进行殖民掠夺，将大量财富运回欧洲并转化为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 19 世纪开始，伴随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发生了变化：“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仅改变了以往东西方若即若离、时断时续的文化交流的走向，而且改变着中国农耕文化的形态，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由此揭开了新篇章，并促使近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加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在近代以来这一复杂、艰难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留学生们积极弄潮，为传播西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东西奔走，上下求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业绩。虽然这期间也有过许多迷惘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研讨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和评述“中学西传”和留学生以前的西学东渐——这不仅对于保持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而且对于进一步科学地看待西学东渐，都是不可缺少的。

一、中学西传的历史回顾和反思

与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走向与作用不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传也曾有过影响西学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她曾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文化之前列，并通过多种方式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中亚、阿拉伯和欧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对人类的文明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般地说，人们常把 16 世纪前后，即我国的明清之际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其实，对这种划分，人们的观点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分析。综合起来看，应该主要有两点：其一，以中国文化在此前后的对比来说明中学的繁荣与衰落；其二，以耶稣教会传教士的东来为依据。这两者相辅相成：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到明清之际已发展到顶点，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因封建专制等原因而未能成长；在封建专制束缚下的中国已开始走向衰落；而新航路的开通和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景象，新生的资本主义文化正越过千山万水向古老的中华大地进发。因此，在此前后的东学西传之内容、性质也不尽相同。

（一）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及其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勤奋勇敢的中国人民，曾创造出四大发明等杰出的科学成就。在 15 世纪以前，中国文化远远地居于世界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其他国家文化的前面。据 1975 年《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公元前 6 世纪至 11 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 231 项，其中中国有 135 项，占 58.4%；从 11 世纪到 16 世纪，世界上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 67 项，其中中国有 38 项，占 56.7%。世界著名科技史家、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科学历史发展进行了 30 多年的研究后指出：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在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因此，根据文化的传播规律，那时属于先进文化的“中学”之西传是必然的。这种“西传”实际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真的西传——传到欧洲；另一个方向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西传”——即后来才“脱亚入欧”的日本。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张骞就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我国古代通向西方的陆路交通要道。从两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我国与中亚、欧洲各国借助于这一陆路通道，进行了广泛、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我国丝绸织品的西运，即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尤其具有特别的文化传播意义。唐宋以后，“丝绸之路”虽然由于元代蒙古西征而衰落下去，然而，中国文化的西传并未因此而完全中断。截止到明代，中国的西传之物已有：（1）罗盘针，（2）火药，（3）钞币，（4）戏赌纸牌，（5）活字版印刷术，（6）算盘等等。其中造纸、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的发明与西传，对人类文明影响甚大。

恩格斯指出，中国文化的传播有些是以直接方式传播的，如养蚕业“在 550 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①；有些是间接的传播方式，这要归功于阿拉伯人。“棉纸在 7 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 9 世纪输入意大利。……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 年左右……

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与影响

磁针之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 年左右……破布造纸,14 纪初叶……木刻和印刷——同时”^②。

中国印刷术之传于欧洲,许多人归功于马可·波罗。

造纸术的传播,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内部交流,从而使此后的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希腊罗马的人,从来没有想到纸的发明,我们还是靠中国人蔡伦的智慧,才能享受现在这种便利。”^③

中国火药的西传,实际上就是中国制硝技术通过阿拉伯而传到欧洲。蒙古军的三次西征以及伊儿汗国的建立,把中国的火药与火器的制造技术带到了阿拉伯,阿拉伯人从而对火药、火器有了感性认识。在 7—13 世纪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阿拉伯人又学到了有关硝石的药物和化学特性的知识,逐步掌握了硝石的提纯技术,为他们仿制和改制中国传来的火药与火器奠定了基础,最终在同西班牙人的战斗中,把源于中国的火药与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技术传到了欧洲。恩格斯说,欧洲人对于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也起了变革的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成为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④。

中国的指南针也经阿拉伯人西传于欧洲。关于指南针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德国学者亚可布(Georg Joclb)在《论东方对于西方文化之影响》中说:“我们近代的世界观的形成全靠深入异邦文化的精神,只有罗盘针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种境界。”过去,“希腊罗马的航行只限于沿海,地中海那样一个小海占据了四周的土地,人文主义者就以为这是世界帝国了”。也就是说,指南针的西传,促使了地理的大发现,开拓了欧洲人的眼界和视野。

总之,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主要代表的物态文化的西传,对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于欧洲近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恩格斯认为：“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程大为迅速。”^⑤

我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⑥因此，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划时代变革，是与我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

另外，我们还要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马可·波罗游记》曾被称为描述“Cath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此书在14、15两世纪风行一时，曾使欧洲人耳目一新。那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因而，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著名史学家和哲学家朱谦之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⑦中曾概括为三点：1. “地理之大发见”，即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个诱因；2. 唤起了欧洲人对“美的与物质的生活之愿望”；3. 唤起了欧洲人“自由研究之精神”。朱先生还认为，达芬奇的不朽之作《蒙娜丽莎》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山水画；薄伽丘的《十日谈》第十日第三故事中采用的“契丹”题材，也表明中国题材对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对欧洲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切不可沉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这不仅因为后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已落后于西方文化，而且在当时，中国西传的文化也并不是中国文化观念的西传，而只停留在物态文化方面，即主要还是属于工艺——科技文化的层面，

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与影响

如古罗马的名媛贵妇如何穿上了汉帝国的丝绸，中世纪旅行家对中国文化并未深入研究的见闻等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并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观念那样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更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长期被用来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其中的原因是令人深思的。

（二）明清之际的中学西传及其影响

这阶段中学得以西传的主要媒介是来华传教布道的西方传教士，例如人所共知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这些人来华的目的不尽相同，除了传教之外，或多或少地带有殖民性质的文化侵略色彩；其中也有的因为长期居留中国，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和人民产生了好感。后来，他们不仅在传教布道的同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著作，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在客观上成为中学西传的传播者。

在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到处传教，游历四方，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现了一个新鲜奇特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人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晚年所写的《中国札记》，详细地叙述了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过程以及中国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是一鳞半爪，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而正是利玛窦弄清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因此，利玛窦被称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之第一人”^⑧。

后来，这部札记被传教士金尼阁带回欧洲，于 1615 年在德国出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广泛，影响甚大，“对欧洲的文学和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 17 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它开启一个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⑤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因读了这部书才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文化首先是通过传教士的翻译而传入西方。许多主要的儒家经典，都有了西方译本。例如，《大学》被殷铎泽和郭纳桑合译为《中国之智慧》；殷铎泽又译《中庸》，题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刘应译《礼记》部分篇章；马若瑟、孙璋都曾译过《诗经》；雷孝思译《易经》；卫方济编译的《中华帝国经典》就包括了《四书》、《孝经》，可算是当时中国经典较完备的译本了。

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 年在巴黎出版。杜赫得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入了这部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今古奇观》和《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法文版《赵氏孤儿》出版后，五六年内就有了两个英文译本。英国剧作家经过加工和再创作，编出了四五个改编的剧本，并于 1759 年在伦敦上演。18 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歌德在《赵氏孤儿》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了悲剧《爱尔培诺尔》（未完成）。

《好逑传》在欧洲流传也较广，如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曾从葡萄牙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歌德曾读过德文本《好逑传》、《玉娇梨》、《花娇记》和《百美新咏》，还据此写成了颇具中国情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席勒想改写《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

在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和介绍方面，来华传教士也取得了较

总论 留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与影响

高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词书，它以利玛窦等人编的汉字注音书为基础，并在中国学者王征、韩云等人帮助下完成。编著此书的目的是帮助西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为汉语拼音化开辟了道路。

此外，1687年来华的白晋编有《中法小词典》，并以拉丁文和法文写成《中文研究法》。1728年，马若瑟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文概说》，分析汉字的结构与性质。因此，他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字的先驱。18世纪，魏继晋又编成《汉德字典》。

由于长期生活工作于中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所以，17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不限于一般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还对中国的历史作了专门研究，如卫匡国著有《中国历史》(第一部)(1658)；冯秉正著《中国通史》(1783)；宋君荣著《唐代史》；白晋著《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1697)，即康熙皇帝的传记；李明著《中国现状新志》(1696)等。传教士还有研究经书和孔子学说的专著出版，如刘应的《易经概说》，白晋的《易经要旨》，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马若瑟的《经传议论》，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无名氏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等等。这些著作虽然学术质量不很高，但欧洲人却由此进一步真实地了解了中国文化。

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也作了一些研究和介绍。例如，宋君荣曾对中国天文学史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天文学论文集》(1732)、《中国天文学简史》(1732)、《中国天文学史》(1738)。巴多明同法国金石美文学院、科学院，圣彼德堡科学院保持通讯联系，介绍了中医学，并把大黄、当归、阿胶等多种中药推荐到四方。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徐西欧的学生汤执中，常把大量的中国植物标本寄给徐西欧，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植物学。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

关于此时期中学西传后产生的影响，学术界看法颇不一致。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有一种渐渐上升的趋势。这可能由以下原因决定：

其一，随着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体系，最集中的当推著名学者季羨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从文化、哲学、科学、军事技术等不同方面较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中学的西传及其影响；

其二，随着近年来国内民族主义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倾向渐趋高涨；

其三，有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例如化学武器的扩散、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以及生物技术（例如克隆技术）给人带来的忧虑等；

其四，受到某些西方学者在特定情况下对中学的赞誉。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974年9月在美国《思潮》上发表的《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一文中说，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景就是可悲的。他对中国的肯定态度是积极的，中国文化中确有其独特价值。但如果“中国文化”所指即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说法则显然是片面的；如果不是指传统文化，而他当时所指又实在不能用什么其他的中国文化来代替。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对西传的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情不自禁地加大了肯定的份量。例如，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影响的研究有许多重大突破，其《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即为其代表性成果之一。但就是在该书中，个别提法恐怕难以成立。如他认为，在罗丹柯运动时期，中国的经书和孔子已逐渐被介绍到西